

清末民初閩浙地區人口流動與都市化的演進（一八六六—一九一六）

李國祁

本文係個人參加國科會集體研究計劃「中國近代化之區域研究」成果的一部份，故在此向國科會申謝。

一、前言

人口流動與都市化作用均是造成社會變遷與近代化的主要原動力，閩浙地區在十九世紀後期二十世紀初期曾因戰亂及經濟因素，發生巨大的人口流動，此一人口流動在發生的時間上恰當西力衝擊，兩省對外貿易興旺之時，故是與兩省都市化現象相伴而成長。本文討論此一問題，目的在探討當時本地區人口流動與都市化作用的實況，以及其對社會變遷與近代化作用所造成的各種影響，俾可明瞭何以在本地區內其社會變遷與近代化作用，於地理分佈上，有強烈的不同。

二、浙江人口流動與都市化作用的實況

清季造成浙江地區巨大人口流動的主因，在於太平天國之亂。浙江自咸豐八年以後，始淪為太平天國之亂的戰場，故在時間上，受太平天國之亂的影響遠晚於其他長江中下游各省，但其遭受戰禍的慘烈，却又遠甚於湘鄂贛閩諸省。根據記載，浙江在咸豐七年（一八五七）時，計有人口三〇、五九六、〇〇〇人，至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却減為六、三七八、〇〇〇人。（註一）即太平天國之亂，使浙江人口銳減了咸豐七年時的七九·一五%。儘管此二人口數字記載，頗有不確實之處，但太平

天國之役使浙江地區人口銳減，應是不爭的事實。一般而言，戰亂地區人口減少，戰後自然會有其他地區的人口移入。浙江遭受太平天國戰禍最烈的地區，是浙西浙東平原地帶，以及山區的金衢嚴三府。而其移入的新居民約可分為兩大類，一是來自本省其他受戰禍不強烈以及人口過剩地區。一是來自於他省。由下列的各種記載，可知其人口流動的梗概：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四月十九日申報：「浙省自髮逆肆擾以來，迎計各府，惟杭州湖州兩府各屬受災最嚴重。……自幾次被賊竄之後，人民離散，田野荒蕪。光復之際，地方幾無人焉。……溫台濱海之區，平時內地常人滿，無田無產，則入海而為盜。粵匪至浙東迄於寧波，而不及溫台，故受災轉輕。……聞杭湖各屬有招人墾荒之舉，皆願來也。或携家而至，或結伴而行。……此外更有遺撤之勇流落不歸者，亦改而務農。其人則皖楚閩粵不同鄉貫。」

金蓉鏡均賦餘議載嘉興府情況說：「咸同兵火之後，田地荒蕪，迄未復額。非惟人戶凋耗，亦以重賦所困。……自光緒間墾荒令下，客民叢集，有溫台幫寧紹幫，有河南江北幫，均係無業游民，恣為盜賊，又為土著添一苦累。」（註二）

南潯志載：「粵逆平後，戶口凋殘，鎮之四鄉荒田計十之三。」「溫台人及湖北人（應係指太湖以北之人）咸來佔耕，自同治至光緒初年，湖北人蔓延郡東，佔耕無主田，搭蓋草棚，每圩佔者不下數十百畝。」（註三）

戴槃嚴陵記略載：「外來墾戶由江西來者，則有衢屬之荒田可耕，由寧紹來者，則有杭屬之荒田可耕。」（註四）

吳承志遜齋文集載：「縣中（錢塘）舊俗本以離鄉棄井為重，近四五十年，以浙西及江蘇偏僻諸縣開墾荒業，前往營田，多得上腴之利，移家置宅，為富人居，鄉里喧傳，群趨若鶩。」（註五）

由上引的各項記載，可知當時省內人民流動的方向是：溫台寧紹地區的人民移向杭嘉湖，這些移出的人民大多是沿海及山區的農民，他們移往杭嘉湖地區，多數仍以佃種田地為生。甚至有的春出冬歸，作季節性的短工。台州府志曾記載說：

「台郡庶而不富，生齒日繁，人浮於地，田不敷耕，天仙尤甚。或散之四方，覓食勞工。黃太人稔稼穡，赴杭嘉湖甬佃農，以億萬計。往往春出冬歸，健者或積資置產不返，佔客籍焉。」（註六）

省內移往戰亂之區耕種者，除溫台寧紹地區的人民外，亦有不少是附近山區的棚戶。所謂棚戶，根據汪元方請禁棚戶開山

阻水以杜後患疏，可知是省外江蘇淮安安徽安慶以及省內溫台人民早期來杭湖地區棚居山中，開山耕種者。（註七）實際上，棚戶不僅限於杭湖地區，浙省各府皆有。由於他們是外來的客民，自成團體，以種山爲業。本地農民多輕之，不與爲伍。故在戶籍上被另編冊籍，稱之爲棚戶。而今因平地居民銳減，遂得移入農耕富庶之區，與原居民相混合。當時除杭嘉湖地區外，其他如嚴州等府，亦曾廣招棚戶開墾。（註八）

至於省外移入的人民則以鄰省安徽（特別是徽州各縣）江蘇（蘇北）江西福建爲多。如杭州府志載：「近年增以閩甌廠民種山者，較前尤夥。」（註九）甚至河南湖南亦有相當居民移入。這些移入的外省人民雖絕大多數仍是務農，但應亦有不少業商者。惜由於資料的缺乏，無法知其詳情罷了。

概括言之，浙省由於太平天國之亂，浙西平原人口銳減，田地荒蕪，於是造成省內的沿海及山區居民與省外人民向此地區流動。由於銳減的人口多數爲農民，故移入者亦以農民爲多，因此在人口流動的特徵上，是屬於社會下層的水平流動。究竟因此一戰亂所造成的人口流動在數量上有多強烈，雖因缺乏詳細資料，難於正確統計，但由下列少數農業地區的人口數字比較，仍可約略看出其端倪來：

於潛縣：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全縣計有二、〇五四人，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增爲一六、五八六人，增加七〇七・五〇％。（註一〇）

海寧州：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全州計有四三、一三二人，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增爲三三〇、六九三人，增加六六六・七〇％。（註一一）

昌化縣：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全縣計有三七、一六六人，光緒卅四年（一九〇八）增爲六四、五三八人，增加七三・六五％。（註一二）

上述三地區於潛縣在十六年間人口增加了七倍有餘，海寧州於九年間人口增加了六倍餘，顯然都非因人口的自然增長所造成。移墾爲其主要因素，應是不容置疑的事。昌化縣在廿五年間人口增長七三・六五％，雖然所呈現的移墾因素不如前二者明

顯，但因清代籍冊的人口數字是財稅人口數字，一般慣例均盡量予以少報，故往往數十年籍冊的人口數字不增加一人，甚至略有減少。如由此一觀點視之，則昌化縣的此兩年代人口數字之比較，應亦顯示出相當的移墾因素來。

其他地區，如湖州府附廓縣烏程，在乾隆廿一年（一七五六）時人口有一七四、二七〇人，至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增加為三六〇、七三六人。（註一三）即一百十六年間，人口增加一〇七％。由此增長的百分比，雖然無法看出其因移墾的關係人口增加的概況，但如將之與嘉興府的情形相比照，仍隱約可看出移墾是其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嘉興府在乾隆卅四年（一七六九）時，人口為七七〇、五七七人，至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已增至一、一二一、四三七人，即六十九年間人口增加了四五・六六％。及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因太平天國之亂，人口再減為二九二、六八七人。（註一四）亦即同治十二年的人口較乾隆卅四年減少四七七、八九〇人。一〇四年間人口減少了六二・〇二％。而湖州府的烏程縣在一一六年間反而增加了一〇七％，湖州府受太平天國之戰禍遠較嘉興為大，諸此因素互相參照，可了解烏程人口的增加，移墾的關係應居於重要地位。太平天國之亂對浙省社會上層的人口流動影響較小，但仍可說是相當強烈的。就一般情況而論，其影響不外有二：一是社會中權力階層士紳階級在不少地區因死亡人數多而減弱。一是不少士紳因戰亂關係而移居於通商口岸如上海寧波，或其他安全地帶的城市，使其在本鄉土的影響力減小。關於前者的情形，記載極多，如陳示繩在兩浙庚辛紀略中記載杭州第一次淪陷時說「中丞及王方伯友端葉觀察堃死於署，繆都轉梓仲孫觀察懋戕於城。署仁和令李司馬福謙哭於城隍廟而自縊。其餘官紳士女死者約六七萬人。」（註一五）

又如許瑤光輯談浙中記載杭州第二次淪陷時說：

「王壯愍回署自經死，學使侍郎張錫庚處州鎮文瑞均死之。胡元博投望仲橋河死。其自饒廷選及各司道以下官共五六百人，無一能出者，旋有死者。該保甲籍居民計六十萬，半已餓死。時嚴寒，被驅被擄，死者復相繼。」（註一六）

再如越州紀略中記載紹興情形說：

「民死於賊者可十萬人，死於貧病者，燬於火者，亦萬家。」（註一七）

上述的這些記載，雖然數字有欠確實，或死者並非均是士紳，但因太平天國之亂，浙省士紳階級受到相當摧毀，應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士紳因避難而移居他城的情形，準確資料雖然闕如，但仍有少數的記載報導出其一鱗半爪的情況，如湖州府志載：

「是年（同治元年）收養難民九千四百有餘。……後林亦於五月起設同仁局，收養過往難民九千二百有餘。……其有赴滬者，滬上設客寓二處，又蓋蓬廠十餘間，留養難民一千四百有餘。」（註一八）

湖州府志所載雖係泛指所有各類難民，但其中應有士紳階級，應是可以肯定的。當然士紳階級比較富有，不少在亂事方起時，已避居他城，特別是上海與寧波。但這些遷居往往是家庭或個別的行動，舉族同行或集體湧往者較少。

綜上所述，可知由於太平天國之亂，曾造成浙江地區人口的急劇流動。此一口口流動雖然是在社會下層較為強烈，但就整體關係而言，却為本地區的社會帶來無比的影響，使其有急劇的變遷。首先本地區的社會組成份子因這一口口急劇流動而有新的融合，浙省的民性因山區與平原的地理環境不同，各地區間相差甚大。杭嘉湖地區民性柔靡，金衢嚴處地區有力而無胆，紹興地區智巧有餘猛勇不足，溫台寧地則氣質驍悍，勤儉善於經商。（註一九）而今因人口流動得以重新融合。雖然此一經重新融合而形成的新民性，由於記載的缺乏，無法知其詳，但就常理而言，應是較舊有的為優秀活潑。日後浙人在我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有突出表現，似可能與此新民性有關。何況當時浙省新民性的融合尚不僅限於省內，尚有省外如蘇皖湘豫閩等省民性因素在內。

其次，由於浙省在太平天國之亂中人口銳減，致而其人口過剩的重負解除，加以戰後移民補充得宜，遂能造成浙省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的經濟繁榮。更因此經濟繁榮而帶動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浙省在咸豐七年時，全省人口的平均密度已高達每平方公里三百人之多。（註二〇）其每人可得的耕地面積，在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時，約為一點五畝。（註二一）而至一九一一年時，平均人口密度業已降為每平方公里一三八人。（註二二）每人可得的耕田面積，如以咸豐元年時的耕田面積計算，已增至三點三三畝。每人可得耕地面積三點三三畝，如以陳重民所定的標準，我國南方每人須得田二畝方足溫飽來看，則此

時浙江超出標準甚多。甚至以美人貝克的标准我國平均每人須得田四畝方能維持生活來看，浙省在廿世紀初人口與耕地面積的分配亦是約略合乎標準的。故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浙江經濟的繁榮是有其原因的。大體而言，太平天國之亂所造成浙省人口減少的情況，對該地區日後的社會經濟發展是相當有利的。蓋解除人口過剩的重負，遂使其社會經濟能有極為活潑的突飛猛晉。

再則由於戰亂的人口流動，部份浙人因徙居於通商口岸上海寧波，而吸收了新知識新觀念，亂後返鄉，很自然地將之輸入浙省內地，而造成其社會或經濟技術方面的改變。最好的例證，則為南潯鎮經絲製法的改進。時因絲商於戰亂期間移居上海，自日人處學得新技術，日後輸入故里，遂使南潯絲產在品質上大為提高。當然亂後移入的新墾民亦同樣輸入不少新知識新觀念，故太平天國之亂對浙省的社會變遷與近代化產生了莫大的助力。這些助力今日由於資料的缺乏，雖難一一具體予以例舉說明，但絕對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當時的人口流動亦為浙省社會帶來了不少的新問題，特別是不同民性的居民同居於一區域內所發生的各種磨擦。除因爭產而發生的經濟性糾紛外，其他最為嚴重的仍是客民與原居民間的互相排斥。如棚戶素被視為行為不檢的貧農，畚客丐戶（勾）素被視為賤民。（註二三）此外如台州人性強悍好鬥。這些各種不同的客民與原居民間，或客民與客民間，所發生的種種磨擦，因大多發生在社會的下層，而當時浙省各地的社會權力階層士紳階級未曾因戰亂而受到動搖根本的損害，故整個社會秩序仍得維持，未曾因此而造成大的動亂。由於此類磨擦多發生於社會下層，故缺乏有系統的報導，僅由少數地方性記載中，可窺知一二。如金蓉鏡在均賦餘議中曾說：

「（嘉興府）自光緒間墾荒令下，客民叢集，有溫台幫、寧紹幫、河南江北幫，均係無業游民，恣為盜賊，又為土著添一苦累。」（註二四）

又如湖州府志載：

「（烏程縣）有恒產者復受制佃戶。」（註二五）

南潯志載：

「溫台人及湖北人咸來佔耕，……每圩被佔者不下數十百畝，秋收僅錢糧數百文，向之業主不敢顧問。且性情狼戾，欺壓土著，時多口角，地保圩甲亦畏之如虎。」（註二六）

再如蕭山縣志稿記載其新墾區客民生活說：

「豐歲所入，粒米狼戾，椎牛釀酒相角逐，用財如糞土，僑戶客作結廬而雜處，重意氣，矜然諾，以軀藉交執仇。歲一不登，流徙失業，散而之四方。故其俗號為難治。」（註二七）

這些記載中均充份流露出客民是生活習慣不同的一群人，與原居民相處並不融洽。

浙省此時期的人口流動在另方面亦受到對外貿易興盛，經濟繁榮，以及交通發達的因素影響。根據海關報告，杭嘉湖寧紹五府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共產生絲二、七九五、二五四公斤，七九年（光緒五年）共產生絲三、一七六、二五五公斤，（註二八）如以當時寧波粗絲價每件（三點九公斤）銀十兩計算，（註二九）則一八七八年五府產量共值銀七一六萬七千三百十八兩，七九年共值銀八一四萬四千二百四三兩。寧波粗絲品質較低，不能與湖絲相比，故實際上五府絲產所得的總值尚應高於此。五府面積不廣，每年僅絲一項已有逾七百萬兩的收入，其對外貿易所造成的巨大經濟利益，可想而知。當時人口向此地區流動，除戰亂使本地區人口銳減的因素外，經濟上的吸引力應亦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就交通言，浙省河流縱橫，水路交通發達，十九世紀末內陸河流及沿海多已通輪航，自對人口的流動亦產生有相當的助力。

總之，由於經濟的繁榮與交通的發達，使浙省太平天國之亂後的人口流動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仍持續不已，並且產生了新的形態，即人口逐漸向平原富庶之區以及通都大邑集中，致而產生了新的都市化現象。杭州府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時，全府僅有人口六二一、四五三人，（註三〇）但及一九二八年，僅杭州市縣則增為八一七、二六七人。（註三一）即一九二八年杭州縣市的人口是一八八三年杭州府全府的一·三二倍。茲將杭州縣市一八八四、一九一一及一九二八年三年代人口數字比較於下：

地區	一八八四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二八年			
	人 數		人 數		較一八八四年增加情形		人 數		較一九一一年增加情形	
					人 數	百分比			人 數	百分比
					平均每年增加百分比	平均每年增加百分比			對一八八四年平均每年增加百分比	對一八八四年平均每年增加百分比
杭州	二五三、八一〇人	六八〇、二八七人	四二六、四七七人	一六八、〇三%	六、二二%	二八七、二六七人	二三六、九八〇人	二〇、一四%	三、一八%	

資料來源：一八八四年及一九一一年數字取自杭州府志，係以錢塘及仁和兩縣合併計算，一九二八年係根據浙省第一期調查報告。

由上表可知杭州城人口在一九一一年時，已較一八八四年增加四二六、四七七人，即廿七年間，人口增加了一六八、〇三%，平均每年增加一八八四年的六、二二%，而一九二八年較一九一一年人口增加了一三六、九八〇人，即十七年間，人口增加了二〇、一四%，其增加的人數對一八八四年而言，平均每年三、一八%。因此可知杭州地區都市化發展的速度，就人口增加而言，是一八八四至一九一一年間，大於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年間。而此時期也正是杭州縣貿易最興盛時期。（註三二）甲午戰後開為通商口岸，廿世紀初期滬杭鐵路的興建，對其都市化作用均產生相當的影響。

其次就杭州本身各區而言，則錢塘縣境人口增加尤為迅速。在光緒十年時，該縣僅有六七、六三〇人，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時，已增為三七七、五五九人，即廿七年間人口增長了四五八、二七%，平均每年增加一八八四年的一六、九七%。（註三三）錢塘縣轄有杭州城西南部，亦即瀕臨西湖及錢塘江之區，受太平天國之亂破壞較少，是杭州城的繁盛之區，其人口在清末的急速增加，正代表此時期的杭州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謀生較易，人口趨向都市而形成都市化的現象。其他如城東羊市街地區，原本極為荒僻，因滬杭鐵路經此設站，遂馬路縱橫，商旅雲集，成為重要市場。（註三四）

寧波是浙省設立最早的通商口岸，由其人口增長的情形，亦可看出該城都市化作用的急劇發展：

地區	一八五五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八年			
	人 數		人 數		較一八五五年增加情形		人 數		人 數	
					人 數	百分比	平均每年增加百分比	人 數	百分比	對一八五五年平均每年增加百分比
鄞縣	二二四、五三二	人	六五〇、二二〇	人	四三五、六八九	三〇三・〇九%	三・五六%	七三〇、四三二	八〇、二〇二	二二・三四%

資料來源：一八五五年數字取自賦役全書（見鄞縣通志輿地志頁二九四下），一九二一年數字取自鄞縣通志，輿地志頁二九五頁上，一九二八年數字取自年浙省第一期調查報告。

由上表可了解一八五五至一九二二年間，鄞縣人口增加了四三五、六八九人。即五七年間人口增加了二〇三・〇九%，平均每年增加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的三・五六%。而一九一二至二八年間，十六年增加八〇・二〇二人，即一九一二年的二・三四%。其增加人數對一八五五年而言，平均每年增加二・三四%。故其都市化情形亦是清季時期發展較一九一一至二八年間為迅速。唯上述的數字尚包括有鄞縣的鄉區在內。如僅就市區而言，則情形如下：民元年（一九一二）時寧波城府共有人口一四六、六一七人，（註三五）至一九二八年時，則增至二一二、五一八人。（註三六）十六年間共增加六五、九〇一人，即一九一二年的四四・九五%。顯然城區人口增加的速度較同時期鄞縣全境為大。換言之，在一九一二至二八年間寧波地區人口的增加，城區較鄉間為迅速。亦即都市化的發展仍在不斷進行之中。

嘉興城急劇的都市化作用則發生較晚，根據日人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三卷浙江省一書所載，其城區人口在民國初年時，僅有四萬人，（註三七）及一九二八年竟增至一〇二、三二九人，（註三八）即十餘年間人口增加了一五五・八%。造成在短短十

餘年間人口增加了一點五六倍的原因，顯然是滬杭鐵路的通車。由於鐵路交通，使該城工商業興起，經濟繁盛，遂有都市化作用產生。

溫州城的情形亦約略相仿，根據一九〇六年（光緒卅二年）的中國坤輿詳誌載，其人口數為八萬，（註三九）至民國初年，一般說法為十二三萬人，據日人的推算為九萬人。（註四〇）至一九二二年，根據海關調查，則為一九八、三〇〇人。（註四一）即十五年間，人口增加了一四七·八五%。而且人口增加的速度是民國以後較清末為快。換言之，其都市化作用的急劇進展在民國時代。造成此時期溫州都市化急劇進展的原因，似應與小工業的興起與茶的貿易興盛有關。（註四二）至於一八七七年開為通商口岸對溫州城市發展的影響，由於人口數字缺乏，實難明確加以說明。唯就常理而言，似應有助長的作用。

以上四城皆為原係浙省政治或經濟大城，今因西力衝擊，貿易興盛，交通改善，而於太平天國之亂後，產生新的都市化作用。至於一般較小的市鎮在此時期內發生都市化作用者，茲以浙西平原為例，其情形如下：

（一）湖州府所屬各鎮

南潯鎮：屬湖州府附廓縣烏程，在府城東七十二里，地近太湖，是絲的專業市鎮。設鎮始於南宋時代，但其興起却在清代絲的對外貿易興盛之後。潘爾夔在潯溪文獻中已稱：該鎮「園園鱗次，烟火萬家，茗水流碧，舟航輻輳，雖吳興之東都，實江浙之雄鎮。」（註四三）該地蠶桑及絲織業之發達，由下列記載可知其大概：

南潯鎮志：「鄉間隙地無不栽桑，唯壩墓廟宇園亭始植木。」（註四四）

溫豐南潯絲市行：「蠶事下畢絲事起，鄉農賣絲爭赴市，市中人塞行不得，千聲萬語聾人耳。……市儈販夫爭奔走，熙熙而來攘攘往，一日貿易數萬金，市人誰不利熏心。……小賈收買交大賈，大賈載入申江界，申江鬼國正通商，繁榮富麗壓蘇杭，番舶來銀百萬計，中國商人皆若狂。今年買經更陸續，農人紡紗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紡車，無復有心種菽粟。」

（註四五）

南潯鎮在太平天國時期雖受損不小，但戰後由於新居民的移入，及絲商在戰亂期間移居上海，自日商處學得新技術，反而使絲之品質提高，以產洋經聞名國內，絲業較前更盛，市鎮較前更繁榮。溫鼎在見聞偶錄中說：「亂後鄉人惰於稼而勤於蠶，無不桑之地，不蠶之家。……潯地業絲兼經行者爲多。……凡做經之絲必條紋光潔，價亦勝常，故鄉人繅絲之法日漸講究。……無錫紹興率皆售繭，我潯則無不售絲者。……鄉人費一月之功，苟得豐收，一年取給於此。」（註四六）

當時業絲致富的南潯巨賈極多，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說。所謂四象，係指家產在百萬兩以上者有四人。八牛係指家產在五十至百萬兩之間者有八人。七十二狗係指家產在卅萬至五十萬兩之間者有七十二人之多。在各巨賈之中，更有二家資產竟達一二千萬兩者，故改稱爲獅。（註四七）此等巨賈在戰亂期間移居上海，與洋商往來，故頗沾染洋習，而且思想較開放，具有新知識新觀念。故南潯鎮能改變其生產技術，突破傳統極限。並因經濟繁榮，而社會變遷極速。當時諺云：「湖州整個城，不及南潯半個鎮。」可知南潯在湖州府內經濟之富足與社會之繁榮了。

南潯的人口流動甚大，市民致富後，爲求安全保障，每以上海爲家，因此社會上層的人口流動是趨向於上海，社會下層的人口流動則外鄉移入者多，客民多來自於寧紹地區。亦有不少來自於徽州及廣東。來自於徽粵者多業商。民國以後由於致富遷居上海者多，故市鎮內人口不多，據日人估計，約一萬人。（註四六）其估計似嫌過小。

太湖與雙林：兩鎮皆屬湖州府附廓縣歸安，在其東南。同於明末清初即以產絲著名。太湖於太平天國之亂前，已有人口五千數百戶，亂後恢復迅速。據海關估計，其一八七八、七九兩年生絲產量，每年平均逾五十萬公斤，超過寧紹兩府總產量，幾與杭州全府相當。（註四九）故湖州府志稱之曰：「商賈蕃湊，絲業尤甲一邑，遂爲歸安雄鎮。」（註五〇）亂後居民亦達四千戶。雙林在清代前期極其繁榮，有：「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之稱。據唐甄教蠶記載：「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月百十萬之益。」（註五一）太平天國之亂雙林飽受戰禍，破壞慘烈，亂後因絲之貿易興盛復甦亦快，居民近四千家。據雙林紀增纂一書記載：「惟近鎮數村以絲織爲業，男子或從事於打綫，且必時常出市買絲賣絹，田功半荒，而衣帛食鮮。茶館食肆中醉酒呼號者亦復不少矣。」（註五二）雙林與太湖因經濟富庶，社會繁榮，教育亦

發達，名儒輩出，科第甚盛，充份表示出文教與經濟社會之相關性。

(一) 嘉興府所屬各鎮

王店鎮與新豐鎮：王店鎮位於嘉興城南三十六里，又名梅（會）里。新豐鎮又名平林或新坊，位嘉興東南三十六里。兩鎮同為古鎮，自明末清初即以蠶桑及紡織業著名。由於物阜民豐，商賈輳集，故科第不絕。（註五三）兩鎮對外交通在清季與上述湖州府諸鎮相同，皆以水路為主，有輪船來往。其新興工業為機器碾米業。（註五四）至民國初年已漸駕凌紡織業。由其發展之趨勢，可看出清末民初本地區經濟結構之轉型。即蠶絲及手工紡織業衰落，代之而興者為民食工業。王店鎮因滬杭鐵路經此，故鐵路通車後，都市化較新豐迅速，有電燈廠，其商業以米、紅白糖及糕餅為大宗，貿易以上海嘉興為吐納地。（註五五）

新篁鎮與鍾埭鎮：新篁鎮位於嘉興城東南五十四里，鍾埭鎮位於嘉興城東四十里，兩鎮與王店新豐於明代後期並列為嘉興四大鎮。兩鎮界海鹽平湖兩縣，為東方大港乍浦以西之近海內陸市鎮，對外交通以水路為主，有輪船來往。清季以來兩鎮皆有新式工業或半機器之手工業興起。其新式工業以碾米及織襪為主。半機器之手工業則為織布業。新篁鎮婦女從事家庭紡織業者近萬人，皆以洋紡為原料。（註五六）亦由此可看出我國家庭紡織業之轉型，蓋昔日家庭紡織均以土棉土紗為原料，今則為洋棉洋紗所取代。鍾埭鎮有織工二千人，其土布紡織業一落千丈，布莊多告歇業，代之而興者為織襪業，有織襪廠一家。（註五七）兩鎮工商業發達，新篁鎮有較大型工商業五十二家，資本八七七、五〇〇元，每年營業額二、〇七四、三〇〇元（一九二八年統計），並有電燈公司。（註五八）鍾埭鎮除織襪工廠外，另有繭廠二家。新篁鎮人口據一九二八年統計約八萬八千人。（註五九）

新陸與濮院鎮：新陸位嘉興城西北廿七里，鄰江蘇省。濮院鎮位嘉興城西南卅六里，跨踞嘉興桐鄉二縣，其鎮在嘉興縣內者僅三分之一。兩鎮皆興盛於明代，對外交通以水路為主，通輪航。清季以來有新式工業興起，故能有新的都市化現象發生。其新式工業以碾米電燈紡織為主。較大型工商業新陸有八十一家，資本一、〇三八、八〇〇元，每年營業額二、二六〇、七五

〇元（一九二八年統計），（註六〇）濮院鎮較大型工商業有六四家，資本一四五、三一〇元，全年營業額五〇〇、八〇〇元（一九二八年統計）（註六一）。紡織業新隆以織網為主，濮院則以織綢為主。人口新勝據一九二八年統計，為六萬四千人。（註六二）

（三）杭州府所屬各鎮

拱宸橋與湖州市：拱宸橋位杭州城北十里，原係跨越運河小鎮，自運河淤塞難通航後，地本荒涼，廢墟墳墓萃集。甲午戰後杭州開為商埠，在此設外人居留地，於是蘇滬小輪通航於此，置稅關，滬杭路支綫江墅路亦在此設站，因而工商業繁盛，急劇發展成為杭州城一部份。其鎮分東西兩部份，運河東岸為外人居留區，多旅館業，為娛樂鬧區。運河西岸為工業區，有通益公紗廠。（註六三）湖州市去杭州城五里，在拱宸橋與杭州之間，原係湖州貨物集散地，故市以湖州為名。元末濬廣下塘河為運道；遂益發達。（註六四）清季則因杭州與拱宸橋雙方面的都市化作用，發展成為杭州市區一部份。

硤石、長安與臨平鎮：硤石鎮在海寧州東北六十里，與秀水桐鄉兩縣相界。長安鎮在海寧州西北廿五里，與仁和縣接鄰。臨平鎮在仁和縣東五七里。三鎮皆為明代以來之大鎮，其中長安鎮因傍運河，尤為繁盛。（註六五）清季三鎮原已衰落，因鐵路之興建而復再興。其中硤石鎮並以產絲及棉而著名。其生絲在一八七八及七九年時的產量，約佔杭州全府總產量六一%。（註六六）

由浙西平原上述各市鎮的都市化現象，我們可以看出，造成各市鎮發生都市化現象的主要原因不外有三：一在於交通發達，滬杭鐵路的興建以及輪船的通航，促使若干業已衰落的運河市鎮再度繁榮。硤石長安等鎮的都市化現象顯然因此而生。一在於經濟繁榮，十九世紀蠶絲的對外貿易興盛是促成湖州地區如南潯等絲業專業市鎮在太平天國之亂後得以迅速復興的最根本原因。此二造成都市化的因素也互相影響。正由於交通發達，才促進其經濟繁榮，人口向此地區流動，遂有市鎮興起，都市化的現象因而發生；亦正由於經濟繁榮，而促進其交通發達，人口向此地區集中，都市化現象隨之發生。然而不論由何種因素形成

其都市化現象，唯一且有都市化現象後，則必然對其固有的社會造成急劇的改變。南潯鎮的人口流動使其能接受新觀念，輸入了新技術，並且因業絲獲利者衆，甚至更改變其社會價值觀念。清末該鎮有中科舉大挑知縣而不願爲官仍業絲貿易者。（註六七）僅由此一事例，已可了解，浙西平原在清末於社會價值觀念上有重商的傾向，（註六八）顯然是與該地區經濟繁榮及市鎮的都市化現象有關。再則經濟繁榮與都市化現象亦使浙西平原不少市鎮甚早即有電燈馬路以及新式工廠等近代的設施。這些亦促成浙省的近代化遠較其他內陸省份發生較早亦較普及。諸此種種均在在證明，都市化現象是造成落後地區社會變遷與近代化推行的一項不可忽視的因素。而交通發達與經濟繁榮更直接或間接對社會變遷與近代化作用提供出無比的衝刺力。蓋新觀念的接受與傳播在落後地區或傳統社會，總是經由都市而達於鄉村。

至於政治因素而促成市鎮都市化的現象發生，在浙西平原似僅見於拱宸橋。該鎮的繁榮幾純由設爲外人居留地而形成。

浙東地區及浙西山區市鎮發生顯著都市化現象者，由於資料不足，今日所知，有海門鎮與清湖鎮。海門鎮地當靈江（椒江）入海口，屬台州府，距府城一百二十里，港口良好，有輪航通上海寧波及溫州。靈江流域貨物由此出口，爲台州府之門戶。其鎮區新街部份即輪船航運興起後擴張而成之新鎮區，面積幾與舊鎮區相等。（註六九）故其都市化發生之原因與浙西平原滬杭鐵路沿綫市鎮相同，在於交通結構的改變。

清湖鎮屬浙西山縣，位於江山縣城南十五里，傍錢塘江支流江山港江，爲閩浙贛三省交界之山區貨物集散中心。人口據日人調查，在民國初年，有五千人，遠較江山縣城爲多。市面繁榮，爲江山縣之經濟中心。（註七〇）故其都市化現象之產生亦在於交通。

不少浙省的政治中心——縣城在此時期內亦有都市化的現象發生，唯一一般而言，此種都市化現象不及市鎮顯著。蓋市鎮的勃興在本時期內主要在於經濟及交通的因素，而且發展迅速，都市化現象極其顯著，至於縣城，則因政治性重於經濟性，而且其城市久已建立，城區內空曠之處甚多，故少數的人口向城區內集中，因缺乏精確的人口資料，致而其都市化現象每隱而不顯，無法詳加討論。今日所知者，如嘉善縣城因滬杭鐵路經此，城內有小工業興起，也促成少數人口向城區流動。其他如奉化縣的

附廓地區及河對岸的鎮店大橋，亦有類似的現象。

以上所言係就浙省各地區，特別是浙西平原，城鎮個別的都市化現象而言。至於浙江全省整個都市化現象及其在全國中所佔的地位，由下表可見其梗概：

人 口 數	浙 江	江 蘇	全 國
居民五十萬人以上之城邑	一	二	九
居民十一—五十萬人之城邑	三	八	四一
居民五—十萬人之城邑	五	八	四六
居民二—五萬人之城邑	一〇	一六	二一六

資料來源：1. 本表完全採自竺可楨，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東方雜誌廿三卷第一號，（重印本，第八六冊，頁六五八—二）

2. 本表所據之人口數字爲一九二一年者。

由上表可看出浙江都市化現象不及江蘇，但仍超出全國平均情形甚多。其次就都市人口與全省總人口之比例而言，浙江與江蘇所表現的情況如下表：

城 邑		江 蘇 省		浙 江 省			
總 計	城邑數	人 口 數	佔全省總人口百分比	城邑數	人 口 數	佔全省總人口百分比	
	居民一〇萬以上之城邑	一〇	三、七一〇、〇〇〇	一三・一%	四	一、六九〇、〇〇〇	七・七%
	居民五一〇萬人之城邑	八	六四八、〇〇〇	二・三%	五	四三五、〇〇〇	二・〇%
	居民二一五萬人之城邑	一六	六三〇、〇〇〇	二・二%	一〇	三四五、〇〇〇	一・五%
	居民一一二萬人之城邑	三三	四四〇、〇〇〇	一・四%	六六	七〇〇、〇〇〇	三・二%
		六七	五、四二八、〇〇〇	一九%	八五	三、一七〇、〇〇〇	一四・四%

資料來源：1. 本表完全採自竺可楨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一文。

2. 本表所據之人口數字爲一九二一年者。

由表中百分比之分佈，可了解江蘇省都市人口在全省總人口中之比例之所以較浙江爲高，在於其居民十萬人以上之大城邑較多，而浙江在居民一至二萬人小城邑方面，無論是城邑數及所佔全省人口的比例，均高出江蘇甚多。此一現象實代表兩省都市化的實際情況不同。即江蘇省的都市化發達，其特徵在於境內有十個居民在十萬人以上的大城市興起。造成大城市興起的最主要條件，是交通的樞紐地位。蘇省水運有長江大動脈，陸運有津浦、滬杭、滬寧鐵路，故其大城市交通樞紐地位不僅限於省內，而且是省際的，再加以南京在全國中的政治，與上海在全國中的經濟地位，故江蘇所具有的大城市型的都市化發達實在於交通便利。浙江都市化發達的特徵表現於一至二萬人的小城邑方面，此類小城邑都市化現象的形成，根據本文前面的分析，可了解，是由於小區域性的經濟繁榮與交通樞紐地位，而造成此種小區域性的經濟繁榮主要在於經濟作物的對外貿易興盛，絲與茶的專業市鎮，在此方面佔有重要的地位。小區域性的交通樞紐地位主要在於太湖及其他較小通輪航的內陸河流，以及滬杭鐵

路。由於在地理上浙省缺乏如同長江般的大川，而滬杭鐵路綫又過短，致而浙省的交通結構不及江蘇良好，於是其小區域性的經濟繁榮與交通便利僅能形成小城鎮的都市化現象，而無法造成大城市的勃興。此外浙省經濟繁盛的浙西平原在地理位置上距上海過近，在國際性的巨都上海輻射力的籠罩下，實亦難以再有大城市型的都市化現象出現。然則不論如何，由浙省都市化發達的特徵在於一至二萬人小城鎮方面，已可看出，就都市化現象的普遍性而言，顯然浙江應高於江蘇的。

如僅以都市人口對總人口所佔的比例作為都市化的標準，則浙江在全國中的地位是僅次於江蘇，而遠高於其他各省的。竺可楨在「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一文中，認為江浙兩省的都市人口密度均遠低於工商業發達的國家如英法美日等，僅高於印度。在一九二一年時，印度鄉村人口（都市與鄉村人口之區分以居民一萬人為標準，一萬人以下者作為鄉村人口）佔總人口九四%，而浙江亦為達八五·六%。當時浙江都市化的現象僅約略高於一九〇年的日本，當時日本都市人口佔總人口一三·一%。（註七一）換言之，就都市化的現象言，浙江較日本落後約三十年。都市化現象與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與交通便利等因素有不可分的關係，由上述的比較，可以了解浙江雖在全國中是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的省份，但在世界上仍然是瞠乎其後的。社會學家每視都市化現象為某一地區近代化程度的指標，並以為都市人口如佔總人口七%以上，則其社會已脫離傳統的形態。（註七二）如以此為根據，則浙江都市化現象雖距離歐美近代化發達國家甚遠，則仍然是業已脫離了傳統形態的。

就浙江省內各府的都市化程度而言，雖然根據本文的分析，在湖州府嘉興府兩地區本時期內有不少市鎮興起，但整體上，仍是以杭州府為最高。根據劉石吉在其碩士論文「清代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市鎮的興起」中統計，一八六二至一九〇八年時，杭州府有市鎮一四四，而嘉興府僅有卅九，湖州府亦僅有四一，（註七三）均無法能與杭州府相比。造成此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杭州地區自南宋以來即極為繁榮，其長期累積的都市發展自然遠較嘉興湖州兩府為高。

在清末民初浙省亦有不少原甚發達的城市因某種原因而趨向於衰落，其中最為明顯者，則為紹興。根據各種資料的記載，紹興在西力東漸前，人口有三十至五十萬，而民國初年，日人估計，該城不過五萬人。（註七四）造成該城衰落的原因，似應與海運與鐵路的興起有關。海運與鐵路的興起使其交通結構完全改變，紹興已不居於重要的樞紐地位，再加以太平天國的戰亂

，使其慘遭破壞，於是其都市的重要性乃為寧波與杭州所奪。在經濟情況上，紹興雖然以產酒茶絲著名，唯此類作坊式的工業所具有的經濟能力究無法與新式工業相比擬，而新式工業的興起又每以交通便利與否為必要條件，紹興近代交通條件的不足，遂使其無法突破小區域性的經濟局限，故其城市終於逐漸萎縮成小區域性的形態。由此再度證明，在本時期內，浙省都市化的現象是深受交通結構影響的。

三、福建人口流動與都市化作用的演變

福建的人口流動在近代主要是受：海外移民，經濟作物茶的對外貿易興盛，以及太平天國的戰亂三因素影響。福建地區的海外移民起於何時，今日雖難加以考訂，但自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起，西方各國的船隻即由廈門港載運華工赴南洋及美洲各地。（註七五）從此廈門乃發展成我國主要的勞力輸出港。據廈門日本居留民會一九一七年的報告，在十九世紀末由廈門港移往太平洋各地的華僑，總數在一〇五萬人以上。另根據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四卷福建省一書中記載，閩人移居海外以泉州漳州興化福州四府及永春州為最多。上述四府平均有百分之二點五人口移居海外，永春州更有全村丁壯悉數往海外謀生者。（註七六）根據該書的統計，一八八六至一九一七年間，經由廈門港移出的人口，其高潮期在一九〇〇至一二一年間，平均每年均超出十萬人，其中一九一二年竟高達十二萬六千人。（註七七）另據日本企劃院所編華僑的研究一書估計，廿世紀初期我國華僑共約七百萬，即其中四〇％為閩籍而言，當亦在近三百萬人。至於閩籍華僑所從事的職業，大多數為務農，或出賣勞力或從事手工業及零售商。據日人統計，廿世紀三十年代新嘉坡共有人口十三萬二千餘人，其中業車伕者約一萬五千人，幾全來自福州及福清地區。（註七八）綜括上述，可知福建向海外的人口流動，亦是屬於社會下層的人口流動。

華僑的移居海外，雖不少在異鄉發跡致富留居不歸，但大多數由於各種內在在因因素的迫使，仍懷戀故土，於僑居地賺取財富資金後，返歸故里安居。甚至也有不少做週期性的短工，其本人雖謀生海外，而家庭始終未曾移往，或在海外未曾成家，

每年或每數年必返鄉過活。Philip Wilson Pitcher 在其著作 *In and About Amoy* 一書中統計，在廿世紀初年，每年約有六萬五千人自廈門港移出，五萬人經廈門港返里，大約有八〇%移出的人口仍將返鄉安居。（註七九）故華僑移墾海外的人口流動，就其整體的現象而言，是一種川流不息的社會下層的水平流動，與一去不復回的人口移殖，情形不太相同。這些曾於外洋生活的閩人，返居故鄉後，對當地習俗與觀念改變甚多，於閩省的社會變遷影響甚大。如廈門志云：「賭博盛行。……初由洋船舵師長年等沾染外夷惡習。」「閩人多養子，即有子者亦必抱養數子，長則令其販洋，賺錢者則多置妻妾以羈縻之，與親子無異。」（註八〇）是記載閩南養子及好賭的習俗是因海外移民而形成者。又如同安縣志李春生傳載：「春生與富紳林維源合築（台北）千秋建昌二街，略仿西式，為民倡，洋商多儆此。」（註八一）是記載閩台地區建築式樣因移民而受西洋影響。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一書中，記載晉江縣華僑接受西洋觀念，在家鄉興辦社會事業，計有中學九所，小學二百餘所，養老院二所，育幼院二所，平民救濟院一所，另有汽車公司等。（註八二）上述的這些記載均證明，閩省——特別是閩南地區的近代化與社會變遷，深受其居民海外謀生因素影響。

至於經濟作物茶貿易興盛所造成的閩省人口流動，由於閩茶主要產於閩北與閩西地區，而且其貿易興盛期在一八五三至一八八三年間，故其人口流動亦以此時期此兩地區為最急劇。茲以閩茶主要產地政和縣為例，政和縣屬建寧府，以產工夫茶大白茶著名。該縣在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時，計有民戶一一三、二七〇人，內中流寓人口一八、〇四二人，即佔全縣人口一五·九三%。及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時，總人口為一〇五、三六九人，其中流寓民戶為三一、一二三人，即佔總人口二九·五四%。（註八三）雖然因太平軍之亂，全縣人口減少，但移入者反而增加，由一五·九三%增為二九·五四%，即增加了一三·六一%。儘管我們無法在客民增加數中，將亂後移入數與因茶貿易興盛移入數加以區分，但是產茶區客民的增加受有經濟作物茶貿易興盛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例如蔣衡在禁開茶山議中說：「甌寧一邑，不下千廠，每廠大者百餘人，小亦數十人，千廠則萬人，兼以客販担夫，絡繹道途，充塞逆旅，合計又數千人。」（註八四）海關報告亦說：順昌縣洋口地方閩茶山者多為汀州泉州永春及贛粵人。（註八五）政和縣志更稱：「昔時窮陬僻谷間，多豫魯漳泉汀郡之民，今皆與我同化。」（註八六）

此外，再就政和縣城坊與鄉間在民四年時客民所佔的比例而言，由下表可知其情形：

總計	鄉區					城坊	地區
	小計	太平鄉	東衢鄉	善政鄉	感化鄉	坊	區
總人口	一〇五、三六九	九四、七〇三	一九、五〇四	二〇、八三八	三五、四二六	一〇、六六六	總人口
客民數	三一、一二三	二六、七九七	四、九五八	五、九七八	八、八六六	四、三二六	客民數
客民所佔總人口百分比	二九·五四%	二八·三〇%	二五·四二%	二五·六九%	二五·〇三%	三五·三六%	四〇·五六%

資料來源：政和縣志卷八，頁三下至四上。

由表中之百分比可以看出，城坊客民所佔的比例最大，達四〇·五六%，鄉區則平均在二八·三〇%。鄉區的客民應大多是茶農，而城坊根據記載，工匠則以外省江西浙江及省內寧德、壽寧、古田、福安人為最多。商家除經營茶及木材業多為本邑人外，亦以外省（江西）外邑人為多。（註八七）政和僻處鄰浙江山區，除產茶外，物產貧乏，其外省人或他邑人向此地區流動，主要是因十九世紀後期茶的對外貿易興盛。縣志中曾云：「自大白茶業興，人工昂貴。」（註八八）正由於人工昂貴，才造成外地人前來謀生，人口向此流動。

太平天國的戰亂對福建影響不及浙江強烈，自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以後，太平軍曾數次侵入福建，唯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以前，受戰禍地區僅限於閩北閩西山區，而且多是小規模的寇擾，故受損自不強烈。一八六四年李世賢汪廣洋因太平天國之亡，流竄入閩南，佔漳州汀州龍巖州，一時聲勢頗壯，但於次年五月即為左宗棠軍逐出福建。此次戰禍雖較以前激烈，

唯時間甚短。咸豐七年時福建全省計有人口二〇、六八七、〇〇〇人，（註八九）亂後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減爲一九、三四七、〇〇〇人，即人口減少咸豐七年時的六·四八%。（註九〇）僅由此一數字，已可了解太平天國之亂對閩省的影響是完全不能與浙江相比的。大體而言，太平天國之亂在福建所造成的人口流動，是局部的與小區域性的，未曾引起全省普遍性的人口流動。但在這局部的與小區域性的人口流動中，仍有些地區情形約略與浙西平原相同，如浦城，據該縣志載：

「浦城地當孔道，海禁未開之日，尤覺衝繁，五方雜處，向來本多客民。自遭兵燹後，死亡轉徙，土著愈稀，客籍愈衆。城鄉市鎮列肆坐廬，客民十居八九，而以江右人爲最夥。負販食力之流，又大半皆浙江人。至挾貲遠出，轉運舟車，懋遷貨物者，土人亦十無一二。客民持籌，無不坐致豐盈。本邑居民惟坐收地毛之利而已。客民黨類既繁，權勢遂重，漸有喧賓奪主之嫌。履霜堅冰，客強主弱，所以挾而抑之，是在操司牧之柄者。」（註九一）

顯然浦城因地當閩浙孔道，而太平天國之亂又造成大量人口喪亡，遂使外邑及外省（浙江）人向此地區流動，而形成了喧賓奪主之勢。又如龍巖州，該州地方志雖未明言太平天國之亂後客民移入的實況，但對此次戰亂後閩里的蕭條，風俗的改變，汀泉籍勞工的充斥，却言之鑿鑿。（註九二）

另外在有些地區如建陽政和建甌（建寧府）南平（延平府），太平天國的戰禍與經濟作物茶的對外貿易興盛兩因素交互影響，遂使人口向此等地區流動，祇不過是後者的因素較前者更爲強烈罷了。建陽縣在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時計有人口一、三二八、八一一人，至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因太平軍之亂減爲六七、八九二人，即減少九四·四八%，但及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時，人口增爲二〇一、三三二人，即增加一九六·五五%，該縣志明白記載，人口的急增是因海禁大開，茶業興旺，江浙僑民輾集。及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由於茶業日衰，僑民日絀，人口再減爲一五三、四〇九人，即減少光緒五年的二三·八〇%。（註九三）充份表示出茶貿易與太平天國之亂是造成該地區人口流動的根本原因。

綜括言之，福建省內非通商口岸的人口流動，在十九世紀後期深受經濟作物茶的對外貿易興盛以及太平天國戰亂兩主要因素影響，其人口流動的方向是由沿海及河谷人煙稠密的汀泉福州地區流向山區建陽政和建甌南平及龍巖一帶。甚至鄰省的浙贛

人民亦流向省內邊區貿易興盛處如浦城政和邵武等地，這一人口流動雖在程度上難與浙江相比，但對閩北閩西地區的社會變遷，也產生了相當影響力。

至於沿海通商口岸對人口流動的影響，在福建省最顯著者為廈門港。廈門在開港前於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時，計有人口一四四、八九三人，內中男八三、二二九人，女六一、六六四人。（註九四）開港後，據西人估計，一八四六年（道光廿六年）時，散居附近鄉村居民約十萬人，城區及港區居民約廿五萬至卅萬人，共約卅五至四十萬人。（註九五）即在十四年間人口增加一點五至一點八六倍。可明顯看出，由於開為通商口岸，對外貿易興盛，而造成人口向此地區流動，產生急劇的都市化現象。此後廈門地區因對外貿易無更進一步之發展，其都市化現象乃趨緩和。及甲午戰爭至庚子時期，再起高潮，據海關報告，一八九二至一九〇〇年間，廈門十八區及鼓浪嶼人口共約六七十萬人。（註九六）極有可能，此時期人口增加深受割讓台灣及工業興起影響。蓋因台灣割日，大批台人內渡移居廈門地區，同時亦因新式工業的興辦，使人口再流向城市。此後至二十世紀初期廈門城市的人口非但未會增加，反而減少。據中國坤輿詳誌載，一九〇六年時，僅有十一萬四千人。（註九七）中國鐵路現勢圖附表則稱，居民十萬。（註九八）民七年（一九一八）海關調查報告稱，十一萬四千人。（註九九）日人在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一書中稱，廿一萬三千人。（註一〇〇）雖然上述的這些數字頗有出入，但清末民初廈門地區人口沒有增加反而減少，應是可信的。造成廈門地區人口減少的原因，似應在於貿易衰退與海外移民。如將廈門城市人口減少的情形與一九〇〇至一二年間平均每年約有十萬人自廈門港出口移往海外合併觀之，則可確知，此時期閩南地區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是海外，而非廈門通商口岸的本身。

福州為閩省的省會，自明以後即為省內第一大城，清季除中法戰爭之役外，未曾遭受戰禍，故人口極為稠密。道光九年（一八二九）時，其附廓兩縣侯官及閩縣人口即達九三七、三五〇人。（註一〇一）雖然此項人口數字包括鄉區，但無論如何，由此一人口數字已可了解，在該城未開為通商口岸前，已有極為強烈之都市化現象發生。鴉片戰後，開為商埠，因最初數年貿易不盛，似人口向此城市流動之現象亦不顯著。據西人在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報告，該城及近郊人口應不少於六十萬，

爲通商五口中僅次於廣州的第二大城。（註一〇二）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因茶對外貿易的興起，福州港極爲繁榮。至六十年代初期，茶貿易每年約爲福州帶來價值一百九十餘萬英鎊的出超。再加以此時閩南受太平軍騷擾，人口向福州地區的流動亦甚急劇，對福州地區的社會變遷亦應產生出相當的衝擊力，惜因資料缺乏，無人口數字可作具體說明。中法戰爭以後，茶貿易衰落，福州地區人口亦開始大量向海外流動。（註一〇三）故如新嘉坡等地的勞工，特別是業車伕者，福州籍人數亦多。至廿世紀初期，據閩縣及侯官鄉土志載，其人口數如下表：

地區	總人口數	市 區		人 口		鄉 間		人 口		備 註
		人	口 數	佔總人口百分比	人	口 數	佔總人口百分比	人	口	
閩縣	724,881	290,992	男 170,070 女 120,922	40.14%	男 23.46% 女 16.68%	433,889	男 220,550 女 213,239	59.86%	男 30.44% 女 29.42%	市區人口 除城區外 ，尚包括 南台地區
侯官	456,278	61,087	男 33,323 女 27,764	13.39%	男 7.30% 女 6.09%	395,191	男 222,295 女 172,896	86.61%	男 48.72% 女 37.89%	
總計	1,181,159	352,079	男 203,393 女 148,686	29.81%	男 17.22% 女 12.59%	829,080	男 442,945 女 386,135	70.19%	男 37.50% 女 32.69%	

資料來源：侯官縣鄉土志・卷五，頁三下至四上；閩縣鄉土志版籍略二，頁230，此兩書所記之人口數字應是光緒32年（1906）左右者。

由表中的數字可知福州城鄉總人口在廿世紀初約有一一八萬，與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一書中所載廿世紀二十年代情況，閩侯縣（包括福州市）人口九三萬之說（註一〇四），所多約五分之一，應是可信的。唯在此人口數字中，市區（包括城區及附廓地區）人口僅有三五萬人，充份表示出在此時期內人口向福州地區流動及其都市化現象並不十分強烈。或者其所代表的情狀應與鴉片戰後剛開埠時的情形約略相當。

福建第三個通商口岸是三都澳，開港於光緒廿五年（一八九九），是茶的轉口港，即閩北的茶由此出口轉福州。因開港後貿易並不十分興旺，故人口向此流動及都市化作用均甚緩慢。在歐戰以前，中國記載均作有人口約八千人，日本調查則稱僅有三百戶。（註一〇五）

綜括福建省三通商口岸在人口流動上所表現的情狀，我們可以看出，其情形與浙省的通商口岸杭州寧波不太相同。即人口向通商口岸的流動與通商口岸本身的都市化作用強度不足。造成此種不同的根本原因，在於閩省的對外貿易不及浙江興盛，茶貿易的興盛期過短，未曾為閩省通商口岸培育出雄厚的經濟能力，來帶動其工商業的繁榮，以奠定其強有力的都市化作用基礎。但即使如此，閩省的通商口岸在其社會近代化的作用上，仍曾產生了開通風氣的功能，故閩縣鄉土志說：「雖然輪舟暢行，而泰西之奇技淫巧亦廣續戾止，喧賓奪主之勢既成，並將漏卮不可彈記，而風俗習於淫侈，人心隨而日澆。」（註一〇六）所謂風俗習於淫侈，人心隨而日澆，正是社會變遷的象徵，祇是其強度不及浙江強大罷了。就另一方面言，閩省此時期人口流向通商口岸不及浙江強烈，亦深受海外移民的因素影響。正由於人口流動的主要方向是海外，才使其流向通都大邑的力量減弱，未曾有強大而深厚的都市化作用出現；亦正由於經濟不及浙江繁榮，無強大的都市化作用出現，才使其人口向海外流動。兩者間顯然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互相影響的。

就都市化作用本身而言，在廿世紀初，福建人口在一萬以上的都市分佈如下表：

都市名稱	人口數	資料來源
福州	三五萬人	閩縣及侯官鄉土志
廈門	一一萬四千人	中國坤輿志及海關調查報告
泉州（晉江）	二二萬人	海關調查報告
漳州	一三萬八千人	警局調查共二萬三千戶，以每戶六人計算
建寧（建甌）	三萬二千人	建甌縣志民五年內務統計

水吉鎮（建甌屬）	三萬四千人	建甌縣志民五年內務統計
南平（延平）	二萬六千人	宣統元年縣府調查
仙遊	二萬五千人	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四卷福建省
政和	二萬四千人	同 右
龍巖州	一萬一千人	宣統二年縣府調查
汀州（長汀）	一萬一千人	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四卷福建省
浦城	一萬一千人	同 右
興化	一萬人	同 右
惠安	一萬人	同 右
總計十四城邑	一〇一萬五千人	

茲再根據上表，就都市人口與全省人口之比例，列表與浙江比較於下：

	福 建			浙 江		
	城邑數	人 口 數	佔全省總人口	城邑數	人 口 數	佔全省總人口
居民一〇萬人以上城邑	四	八二二、〇〇〇	四・一一%	四	一、六九〇、〇〇〇	七・七%
居民五一〇萬人之城邑				五	四三五、〇〇〇	二・〇%
居民二一五萬人之城邑	五	一四一、〇〇〇	〇・七一%	一〇	三四五、〇〇〇	一・五%
居民一一二萬人之城邑	五	五二、〇〇〇	〇・二六%	六六	七〇〇、〇〇〇	三・二%
總 計	一四	一、〇一五、〇〇〇	五・〇八%	八五	三、一七〇、〇〇〇	一四・四%

附註：福建省總人口係以一九一八年海關調查數字二〇〇〇萬人為標準。

由表中的各項百分比可看出，福建全省都市化情形比浙江相差太遠，其在世界所居的地位，尚稍低於一九二一年時的印度，如果以都市人口佔總人口7%以上爲其社會脫離傳統形態之標準，則福建省的社會在廿世紀初期，顯然尚未脫離傳統的形態。

福建都市化程度雖然甚爲落後，但就個別地區而言，仍是有少數都市化現象發生。在通商口岸方面，廈門雖在開埠前即爲閩省對南洋及呂宋各島的貿易中心，其人口的結構以業工商者爲主體，但開港後此種趨勢因外國商行的林立，益爲加重，特別是鼓浪嶼地區。鼓浪嶼在廈門開埠前人口僅有二千，較大商店數家，而廈門開爲通商口岸，嗣鼓浪嶼爲外人居留地後，人口立即增加一倍，商行及新式學校林立。此後每當廈門地區政治不安定，則鼓浪嶼人口激增。蓋其情形一如上海，國人多遷此以求安全保障也。辛亥革命時期鼓浪嶼中國人口已增至一萬二千人以上，民國初年更增至一萬五千人。（註一〇七）而且都市之整潔與現代化以及市面之繁榮，與廈門舊城區成一強烈之對照。是爲廈門地區最得風氣之光，社會變遷最速之市鎮。

福州地區在十九世紀後期都市化最顯著者爲南台島。南台位於福州城南數里閩江中，東西袤延十餘里，南北亦寬十餘里，原爲沙地洲地汎地，中外通商後日益發達，而形成市肆毗連，富商大賈麇集，其上杭街爲茶紙等大宗貨物貿易集中地，下杭街爲大商會館所在處。島上人口僅屬於閩縣境者，在一九〇六年時，即有二〇九、九〇二人（男一一九、四〇〇人，女九〇、五三〇人），較閩縣城區人口八一、〇七二人，超出一二八、八四八人，即一五八、九三%。（註一〇八）南台島非僅爲福州地區的商業中心，而且是社會變遷最明顯處，蓋人口結構昔以務農爲主，今則工商居多。福州城內街道狹隘，而南台馬路寬廣較具現代化。

因華僑之返里或對故鄉之投資而造成之都市化現象，則以晉江縣境最爲顯著，晉江即泉州，其地在唐宋時期爲我國海外貿易主要港口，但近代以來，由於廈門及福州的興起而趨衰落，廿世紀初期人口雖較前大爲減少，但因閩籍海外華僑以來自此地區者爲多，故城區及縣境內頗多現代化之各項設施。據日人調查，在廿世紀三十年代，有中小學二百餘所，其中九〇%以上均爲私立，社會福利事業有育幼院養老院平民救濟院等。工廠有五家，資本總額在七十萬元以上，全縣公路縱橫，汽車公司十餘

家，車輛百廿餘輛，以上這些現代化設施幾均爲僑資所興辦。縣境內因僑資及對外交通便利所興起之市鎮，以安海與東石最具典型。安海據同安縣志載：「清光緒年間，廈門創設小火輪船，交通便利，安、南、永各商戶遂向晉江之安海交易，安海商業繁盛，而同城之商務日就凋零，今僅存十之一而已。」（註一〇九）安海因僑資而創設之社會事業，除學校外，有育嬰堂及明慈堂等。東石之繁榮幾可說純粹由於僑資，該鎮有新式工廠四家，工人數百名。全爲僑商所經營。（註一一〇）

閩省內陸的都市化現象多發生於產茶區，亦即有都市化現象者大多爲茶的专业市鎮。如政和與洋口，政和雖是古城，但在近代的繁榮純得力於茶的貿易。故縣志稱：「政最爾邑，百工未備，土木裁縫舊俗不尚淫巧，自茶業興盛，頓改舊觀，陶冶則設廠製造，間有巨賈繳本歸其專賣，操奇贏以牟利者。」（註一一一）又稱：「政邑物產除茶杉筍紙外，別無大宗。每年自三四月茶市過後，不甚熱鬧。」（註一一二）據日人調查，在民國初年政和城內人口約二萬三四千人，因茶的貿易市容頗爲殷盛，城內主要建築物除公立機關外，即爲茶樓。（註一一三）洋口在順昌下游約三十里，爲閩江上游茶口輸出河港，亦爲沿海通商口岸百貨對閩西閩北邵武建寧一帶的輸入河港，商業繁盛，舟車密集。據日人調查，民初時人口約五千，生活程度高，奢侈品無不畢備，房屋高大堅固。（註一一四）顯然爲福州通商口岸新觀念新知識新風氣對內陸傳播的轉播市鎮。故就內陸社會變遷與近代化而言，其地位遠超過順昌。由於十九世紀後期是閩茶的鼎盛時期，故該鎮在此時期內應較廿世紀初期更爲繁榮，其對內陸人口流動的吸引力與社會風氣的影響力亦應更爲強烈，惜因資料的缺乏，今日無法得知其詳。

福建都市化現象的不發達，在根本上雖受其經濟及交通所具備的條件限制，但就社會本身而言，似亦受其傳統習慣宗族集居影響。省內宗族集居的社會習慣常使同宗者數千百人集居於一村，由年高德劭的族長加以管理。致而其村落甚大，而且保守性特強，新觀念與新知識不易在此成長，人們非萬不得已，不願離井背鄉。此種宗族集居的社會習慣尤表現於社會上層，故閩省的人口流動就社會階層言，實表現兩種情狀：社會上層的人口流動呈現遲滯，社會下層的人口流動因係受經濟困窘所迫，頗爲活潑，大量向海外移民。唯因其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在於上層的士紳階級，故社會下層活潑的人口流動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性竟難產生摧毀作用。因之在近代閩省所表現的社會情狀是：一方面大批居民移居海外，帶進了若干新觀念與新知識，一方面其

整個社會仍呈現出保守與遲滯；一方面因華僑的建設有若干較近代化的城鎮出現。一方面其全省整個都市化現象仍停頓於口岸型態之中。這些均充份證明由於經濟及交通條件的不足，華僑人口流動的力量始終未能推動其整個社會的改變，祇是在若干地區建立促進其社會變遷的據點而已。

四、結 論

綜括整個閩浙地區在十九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的人口流動與都市化的演進，可得到如此的結論，浙江深受太平天國之亂影響。由於此一戰亂造成衆多的人口喪亡，遂形成了該省幾乎全面性的人口流動，山區與沿海以及外省的居民湧向平原，使浙江的民性得以重新融合，並因戰亂消除了人口過剩的現象，故融合後的浙江人口充滿了沾潑生動之象。更因絲茶對外貿易興盛的刺激，遂造成其經濟益為繁榮，而社會下層的變遷甚為急劇。其社會上層因權力階層士紳階級未受到動搖根本的摧殘，故其整個社會秩序並不因此急劇的人口流動而遭受破壞，仍保留有其傳統社會的形態。但因西力東漸後不少浙民因經商而致富，且因致富而躋身於權力階層，以及若干社會上層組成份子因戰亂而移居通商口岸，接受新知識與新觀念，故其士紳階級亦在緩慢的轉變之中，重商的傾向可視為一項極為重要的表徵。在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繁榮與交通的改善，通商口岸以及浙西平原地區均有都市化的現象發生，使不少自南宋以來即甚興盛的市鎮，得此活力的補充，並不因太平天國之亂的摧殘而趨向衰落，反而更為繁榮興盛。它們與通商口岸相同，變成為傳播近代觀念與產生社會變遷的重要據點。故如果說太平天國之亂是造成浙省巨大人口流動的原動力，則經濟繁榮是使此人口流動趨向於都市化，帶動其近代化的主要根本。

福建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因有二：一是海外的移墾，一是經濟作物茶的對外貿易興盛的刺激。前者造成了閩南及沿海居民的大量外移，後者使沿海——特別是閩南地區居民向閩西閩北產茶地區移動。太平天國之亂對閩省的人口流動僅有局部性的與小地區性的影響。由於海外移墾並非是單方向的有去無回的殖民，華僑穿流不息的往來於故鄉及僑居地之間，遂造成了閩南地區社

會的開放性，而帶動該地區的社會變遷與近代化觀念的輸入。茶的對外貿易興盛雖造成沿海居民及通商口岸近代化的觀念向閩北閩西山區流動，但由於其興盛期過短，僅僅三十年，故此一人口流動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僅限於十九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至廿世紀初期已趨衰微竭絕。致使閩省日後都市化現象與社會變遷的情狀，均無法與浙江相比。正由於福建在全省的普遍情狀上遠比浙江要落後，故其通商口岸，特別是閩北地區的通商口岸福州才顯得極為突出，都市化的現象與社會變遷以及近代化作用均肇始於此，深符合通商口岸是帶動我國政經社會近代化的理論。

要而言之，在清末民初時期，閩浙地區的人口流動是以戰亂及經濟作用為其重要動因的。而都市化作用則純粹起於交通結構的改變與經濟繁榮。社會變遷與近代化觀念的傳播又是因人口流動與都市化作用而形成。此種情形大致符合「收支相關模式」(cost-benefit model)的理論，即人口流動通常受改善經濟生活所驅使，移住者必先衡量其本來收入及將來收入，如移住後的經濟條件有所改善，生活費用較收入增加數為少，則必遷徙。(註一一五)而且其都市化作用似亦與湯瑪絲 Thomas 一九四一年解釋瑞典的人口移動情形相同，即：農村人口移入都市的最大移動量，在經濟繁榮時期。(註一一六)

附 註

- 註 一：戶部清冊，轉引自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頁十至十二。
註 二：轉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頁一六七至八。
註 三：周慶雲編，南潯志，民十一年刊，卷三十，頁二至三。
註 四：戴槃，嚴陵記略，頁一，定嚴屬墾荒章程並招棚戶開墾記(同治五年)。
註 五：吳承志，遜齋文集，卷一二，頁四三，答問。
註 六：喻長霖等纂，台州府志，民廿五年刊，卷六十，頁一下。
註 七：盛庸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卅九，頁卅二上。
註 八：葛士濟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卅三，頁六下至七上。

- 註 九：龔嘉携修，李榕纂，杭州府志，民十一年刊，卷五五，頁廿九下。
- 註 一〇：全上註。
- 註 一一：全註九。
- 註 一二：全註九。
- 註 一三：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刊，卷卅九，頁三下。
- 註 一四：幼甫修，陸志鴻等纂，嘉興新志，民十八年刊，頁一〇六。
- 註 一五：轉引自太平天國，第六冊，頁六二〇。
- 註 一六：全上書，頁五八八。
- 註 一七：全上書，頁七七三。
- 註 一八：湖州府志，卷十二，頁十六下。
- 註 一九：以上有關浙民性說法，見談浙，此處轉引自太平天國，第六冊，頁五六一。
- 註 二〇：拙著，由閩浙區域研究看清代解決人口壓力的重要方法——栽培經濟作物，食貨月刊，四卷十期，頁三。
- 註 二一：時浙省人口爲三〇、一〇七、〇〇〇人，耕地面積爲四六、四一二、〇〇〇畝，故每人平均可得耕地面積爲一點五畝。
- 註 二二：浙省一九一一年人口根據日本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三卷浙江省，頁一〇記載：計一三、九五〇、〇〇〇人，而面積爲三六、六七〇方哩（即一〇一、〇四七點八五平方公里），故人口密度爲一三八人。
- 註 二三：畚客據遂昌縣志載，係清初自粵徙浙，居於溫處衢三府爲多，力田傭工，不敢與本地人相抗，服飾言語均沿蠻俗。（遂昌縣志，卷十一，頁三至五）丐戶據蕭山縣志稿載：相傳爲宋罪俘之後裔，被視爲墮民，污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蕭山縣志稿，卷一，頁廿五下。）定海縣志時丐戶作勾戶，因定戶籍扁其門，故曰勾戶。以捕蛙編竹物塑土偶爲業，自成團體，不得與民爲伍。（定海縣志，卷十六，頁五二）。
- 註 二四：轉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頁一六七至一六八。
- 註 二五：湖州府志，卷廿九，頁五下。
- 註 二六：南潯志，卷卅，頁二至三。
- 註 二七：張宗海等修，蕭山縣志稿，民廿四年刊，卷一，頁二六下。
- 註 二八：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 No. 3, Silk, p.p. 76-82.

- 註 二九：全上書，頁一〇九。
- 註 三〇：杭州府志，卷五七，頁五下。
- 註 三一：係根據一九二八年浙省府第一期調查。
- 註 三二：由一九〇九至一九一六年間，杭州絲輸出量最高峰在一九一二年，是年輸出額共八千九百擔。
- 註 三三：數字取自杭州府志，卷五七，頁八。
- 註 三四：杭州府志，卷六，頁一下。
- 註 三五：民廿七年刊，鄞縣通志，輿地志，頁二九四下。
- 註 三六：全上書，輿地志，頁二九五上。
- 註 三七：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三卷浙江省，頁八六。
- 註 三八：嘉興新志，頁一〇八。
- 註 三九：宣統三年中國年鑑，頁八。
- 註 四〇：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三卷浙江省，頁五五。
- 註 四一：民十二年中國年鑑，頁五二。
- 註 四二：溫州港的輸出輸入貿易自一九一二年起急增（詳情可參閱：支那省別全誌，浙江省，頁七八），其中茶的輸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每年約值五十萬兩，幾佔浙茶對外總輸出額之半（浙江省建設月刊，四卷五期，頁廿一至廿二，俞海清，浙江茶業調查計劃。）
- 註 四三：南潯鎮志，咸豐九年刊，卷一，頁三下。
- 註 四四：全上書，卷廿四，頁三上。
- 註 四五：南潯志，民十一年刊，卷卅一，頁廿八。
- 註 四六：全上書，卷卅，頁廿一。
- 註 四七：劉大鈞，吳興農村經濟，民廿八年刊，轉引自幅武直譯，中文農村經濟の研究，東京，一九四一，頁二一五至二二二。
- 註 四八：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四卷，浙江省，頁九八。
- 註 四九：拙著，由閩浙區域研究看清代解決人口壓力的重要方法——栽培經濟作物，食貨月刊，卷四期十，頁七。
- 註 五〇：湖州府志，卷廿二，頁九二。

- 註 五一：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卷卅七。
- 註 五二：轉引自田中正俊，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序說，東京，一九七二，頁八八。
- 註 五三：許瑤光等修，吳興縣志，嘉興府志，光緒五年刊，卷四，頁卅五。
- 註 五四：嘉興新誌，頁五九至六十；七六至七八。
- 註 五五：全上書，頁六十。
- 註 五六：全上書，頁七四。
- 註 五七：全上書，頁八四。
- 註 五八：全上書，頁七四至七五。
- 註 五九：全上書，頁一〇八。
- 註 六〇：全上書，頁七一。
- 註 六一：全上書，頁八一至八二。
- 註 六二：全上書，頁一〇八。
- 註 六三：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三卷，浙江省，頁卅六至四十。
- 註 六四：杭州府志，卷六，頁三下至四上。
- 註 六五：全上書，卷六，頁十下至十一上。
- 註 六六：拙著，由閩浙區域研究看清代解決人口壓力的重要方法——栽培經濟作物，食貨月刊，卷四期十，
- 註 六七：南潯志，卷廿一，頁十五至十六。
- 註 六八：當時杭嘉湖因商致富者極夥，在南潯如蔣堂、陳煦之、梅鴻吉、劉鏞、周昌熾、龐雲鑄、梅履中等，在杭州有胡光墉等，彼等皆因經商致富而躋身於士紳階級，成為社會中領導人物，故使該地區社會價值觀念有重商的傾向。
- 註 六九：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三卷，浙江省，頁一二四至一二五。
- 註 七〇：全上書，頁一五〇至一五一。
- 註 七一：竺可楨，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東方雜誌，廿二卷，第一號，（重印本，第八六冊，頁六五八—三）。
- 註 七二：關於我國都市化作用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可參閱：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New Jersey, 1973.

- 註 七三：台大碩士論文劉石吉，清代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市鎮的興起，頁七二，明清兩代江南市鎮統計表。
- 註 七四：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三卷，浙江省，頁一〇八。
- 註 七五：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p. 363.
- 註 七六：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四卷，福建省，頁一九。
- 註 七七：全上書，頁二〇至二一。
- 註 七八：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第一卷，福建省，頁廿六。
- 註 七九：Philip Wilson Pitcher, *In and about Amoy, Shanghai and Foochow*, 1912, p. 161.
- 註 八〇：周凱修，凌翰等纂，廈門志，道光十九年刊，卷十五，頁十三上，頁十四上。
- 註 八一：同安縣志，卷卅六，頁五下。
- 註 八二：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第一卷，福建省，頁卅三。
- 註 八三：李熙纂修，政和縣志，民八年刊，卷八，頁三至四。
- 註 八四：轉引自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一卷，頁四三〇至一。
- 註 八五：轉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頁四四七。
- 註 八六：政和縣志，卷二十，頁一下。
- 註 八七：全上書，卷十七，頁六上至七下。
- 註 八八：全上書，卷二十，頁二上。
- 註 八九：戶部清冊，轉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頁十至十二。
- 註 九〇：全上書，頁十一至十二。
- 註 九一：翁天祐修，翁昭泰纂，浦城縣志，光緒廿六年刊，卷六，頁三下至四上。
- 註 九二：馬蘇鳴修，杜翰笙等纂，龍巖州志，民九年刊，卷廿一，頁十上至十三上。
- 註 九三：趙模修，王寶仁纂，建陽縣志，民十八年刊，卷四，頁二上至三下。
- 註 九四：廈門志，卷七，頁卅二下。
- 註 九五：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p. 363.
- 註 九六：南支那の開港場第二編，頁廿九。

註九七：轉引自宣統三年中國年鑑，頁八。

註九八：轉引自民八年中國年鑑，頁二〇。

註九九：全上。

註一〇〇：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第一卷，福建省，頁四。

註一〇一：閩侯縣志（成文重印本）卷二十一，戶口，頁一載：道光九年，閩縣有五九五、九九四人，侯官縣為三四一、三五六人，兩縣

合計共為九三七、三五〇人。

註一〇二：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p. 488.

註一〇三：關於茶貿易衰落後閩省人口外移情形，可參閱：Pitcher, In and about Amoy, P, 165

註一〇四：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第一卷，福建省，頁二。

註一〇五：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四卷，福建省，頁六八。

註一〇六：閩縣鄉土志，成文重印本，頁三四八上。

註一〇七：南支那の開港場，第二編，頁廿九。

註一〇八：閩縣鄉土志，成文重印本，頁四六。

註一〇九：同安縣志，卷六，城市，頁三上。

註一一〇：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第一卷，福建省，頁卅三。

註一一一：政和縣志，卷二十，頁二下。

註一一二：全上。

註一一三：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四卷，福建省，頁一四。

註一一四：全上書，頁一五七至九。

註一一五：轉引自王月鏡，台灣人口移動及地域發展之研究，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民六十二年。頁二。

註一一六：全上。